

第七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 代 史 资 料

近代史資料

一九五五年 第四期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知識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10

(近代史资料. 第七册)

ISBN 7-80198-588-5

I. 近... II. 中...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2751 号

近代史资料 第七册 Jindaishi Ziliao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责任编辑: 范红延 兰 涛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nipr.com> 邮 箱: zscq-bjb@126.com

电 话: 82000860 转 8324 传 真: 010-82000890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112 千字 定 价: 4000.00 元 (共 100 册)

ISBN 7-80198-588-5/K·00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近代史资料》丛书出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创刊于 1954 年，至今已出版 114 期，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

《近代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刊物之一。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所成立之初，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

《近代史资料》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实有必要。

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以此推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范文澜、刘大年、黎澍、李新等前辈史学家，对此备加关注。《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

自创刊以来，《近代史资料》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其中有档案、函电、日记、

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调查报告、照片、拓片等原始资料，还有年表、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从创立至今，以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仅是该室任务之一。很多列为国家、院、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资料集，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牵头承担，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图书奖、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所以说在此五十多年间，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1 亿字的史料书刊，这包括期刊、专刊、大型丛刊、汇编、资料集等数十种，其中如《近代稗海》、《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大型史料集，所收入的多为稿本、孤本、珍本和中外文档案文献资料，深受学界、学者的关注和好评，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

然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若有可能再版，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功德无量。

章伯锋
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

編者的話

本期六篇資料，多是有關辛亥革命的。

余棟臣與四川農民反帝運動一篇，介紹十九世紀末期四川農民反帝運動的情況。文中說明了鴉片戰爭後六十年間四川社會經濟的變化概況：一、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結合共同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三、帝國主義所豢養的買辦階級發生，爲帝國主義服務與中國人民爲敵；四、六十年間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是農民和手工業工人自發的鬥爭，反抗充當帝國主義間諜和封建惡霸的教堂是鬥爭的主要目標之一；五、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正在日益發展着。文中說明農民鬥爭是由民間秘密結社發動的或者根本沒有任何組織，因此，在鬥爭中必然表現出農民的落後性，以致陷於失敗。文中說明余棟臣起義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余棟臣起義推動了各地反帝反封建革命；這是由民間秘密結社發動的或者根本沒有任何組織，因此，在鬥爭中必然表現出農民的落後性，以致陷於失敗。文中說明余棟臣起義又爲其自身的弱點所限制而失敗了。這一篇爲長編體裁，所引資料經過一番整理，對於研究工作幫助較大，本刊歡迎這種體裁，今後希望能多刊載這種體裁的資料。

長沙搶米風潮、連州事件日記摘要、一九一〇年廣東新軍革命紀實和圖片，全爲辛亥革命前夕人民反抗清朝政府鬥爭的資料。這一些資料使我們知道：一、辛亥革命前夕，被統治者已經不能繼續被統治下去，而是農民、手工業工人、城市貧民和一切勞動人民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反抗鬥爭。二、統治者已經不能繼續統治下去了，清朝政府無法也無力鎮壓普遍於全國的人民反抗。三、反帝反封建革命鬥爭的主力軍是農民，可是當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黨人，只注意新軍和會黨的暴動，却

不去領導廣大的羣衆革命運動。這三篇資料和八幅圖片，既不能概括當時人民革命鬥爭，也不是記載特別充實，只因過去很少有人研究辛亥革命以前的羣衆鬥爭，也很少有人整理這一方面的資料，提供出這些資料，或許能夠對於今後研究辛亥革命史整理辛亥革命史料有一點用處，並希望歷史工作者今後多在這一方面努力。

襄陽光復記和孫中山與袁世凱的鬥爭兩篇，均記載辛亥革命的一部份事實。從這些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一、武昌起義之後，清朝政府陷於孤立；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小資產階級和革命派的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動力；在革命形勢發展的時候，立憲派的資產階級也投機贊助革命，一些封建官僚也被迫贊成革命，一些反動軍閥如袁世凱則陰謀利用革命來滿足自己的野心；因此，辛亥革命不久就推倒了清朝政府。二、反革命的袁世凱在篡竊政權之後，立即向革命人民攻擊；立憲派的資產階級和封建官僚混跡革命之後，首先是攫取政權，打擊革命黨並繼續壓制羣衆革命運動；清朝政府垮台，帝國主義支持袁世凱重新組織反革命陣營，即帝國主義、以袁世凱為首的大地主大買辦階級和立憲派的資產階級以及官僚政客結合在一起向革命黨和革命人民攻擊。三、辛亥革命的領導者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決定了他們在革命起義時就把軍政權力交給了投機官僚和立憲派，決定了他們不能也不敢去發動廣大的人民羣衆；決定了他們在起義之後立即和以袁世凱為首的反革命妥協，並且把政權交給袁世凱；決定了他們在袁世凱已向革命黨和革命人民進攻之後，還是步步退讓，一直到大勢已去的時候才被迫反抗，終陷革命於失敗。襄陽光復正是各地光復的典型事例；袁世凱和孫中山的鬥爭正是反革命與革命鬥爭有代表性的事例。這兩篇記載雖然不見得很詳盡，而對於研究辛亥革命史却有不少可以參考之處。

目 錄

編者的話 ······ (一三)

余棟臣與四川農民反帝運動 ······ 徐慶堅輯 (一)

長沙搶米風潮 ······ 楊世驥輯 (四)

連州事件日記摘錄 ······ 左紹佐 (七)

一九一〇年廣東新軍革命紀實 ······ 莫昌藩 鍾德熙 羅宗堂 (全)

襄陽光復記 ······ 毛拔 (七)

孫中山與袁世凱的鬥爭 ······ 張國淦 (二三)

圖 片

辛亥革命前人民的反抗鬥爭八幀

余棟臣與四川農民反帝運動

徐慶堅輯

編者按：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侵略者逐漸侵入我國各個地區，激起了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四川和各省同樣，因為帝國主義勢力侵入而發生了變化，由封建社會變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四川人民（以農民爲主）也和各省人民同樣，奮起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壓迫；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也和各省人民同樣，首先表現爲驅逐披着宗教外衣而深入農村的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鬥爭。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各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我國，從而各地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亦愈益激烈。一時四川、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山東、江蘇等省農民都發動了反帝運動，而以余棟臣（反革命污衊他爲「余蠻子」）所領導的武裝鬥爭爲影響最大。但是過去的史籍，對於余棟臣的記載較少，使我們研究這一段歷史發生困難。本文把方志和其他資料彙輯成篇，而又搜集了一些余棟臣起義時當事人的回憶，使我們對於帝國主義侵入四川的情況與余棟臣起義的史實得到一個概括的了解。本文所介紹的情況多是片斷的，還不够完整、系統，如深入研究還須進一步去發掘資料、整理資料，這都有待於今後大家的努力。

第一 帝國主義侵入四川

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列強侵略我國，激起了我國人民的反抗，帝國主義勢力所到之處，當地人
余棟臣與四川農民反帝運動

民莫不憤起抵抗。今就帝國主義侵入四川的歷史和它對於四川人民的危害，以及四川人民反帝鬥爭的史實，介紹如左：

(一) 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入四川

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天主教的惡教士爲法帝國主義的間諜，基督教的惡教士主要爲美帝國主義的間諜，並兼爲英、德帝國主義的間諜。英法聯軍之役以後，天主教勢力在四川大爲擴張。「四川、雲南、貴州三省，初惟一主教。至同治初四川一省分三大區，由三位主教經理。」「三主教所轄地面，計洋教士三十七員，華教士五十七員。」（天主教傳行中國考：獻縣天主堂一九三七年版四三一頁與四三六頁）基督教於一八六八年以後進入四川，它的歷史是：

「一、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七年 基督教宣教師首入本省視察者，爲倫敦會楊格非牧師與英聖書公會偉力。二人遨遊全省，通都大邑，足跡殆遍，並嘗至成都一遊，歸而將其沿途經歷之視察情形，述於各國差會本部及在華宣教師之各方面。一八七七年內地會麥嘉底牧師，越萬縣而至巴縣賃屋一椽而宣教焉。

「二、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六年 此時期以內地會之宣教師入省者極衆，一八八一年該會首闢成都爲宣教地。一八八六年至一八八七年該會職員更闢閬中及巴中（舊巴州）爲宣教地。又內地會入成都時，美以美會之華西大會成立，議決以巴縣爲該會在華西宣教之根據地。……在此時期中，內地會之

教區，以嘉陵江爲界而劃爲二：一爲川東區，一爲川西區，而該二區之教務組織法亦各不同：川東區仿聖公會式，川西區則多有仿浸禮宗式者。

「三、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五年 在此時期內即有五大差會同入本省而創辦教務。一八八八年倫敦會始建恒久事業於巴縣，該會在二十年中，得受餐信徒六百餘人，嗣於一九一九年將事業讓於美道會，而退出本省。一八九〇年美浸禮會入宜賓，越四年，入樂山及雅安二城。一八九〇年公誼會於被逐離東川後，即於巴縣開始工作，七年之內即設第二總堂於其間，該會之創辦人爲陶維新夫婦。一八八八年英聖公會 Horsburgh 遍遊全省，尋得本省之北及西北二部之「蠻子部落」（帝國主義污蔑中國人民之語）等處中之各未開闢地。一八九二年春 Horsburgh 率宣教師一團入本省，隨分赴各內地會之總堂內。……一八九四年在中壩、新都、綿陽（舊綿州）、綿竹及安縣等處，各得一立足之地。次年，更入北川（舊石泉州）宣教。一八九五年內地會川東區之教務總理蓋士利被立爲華西主教。查華西前爲華中之一部分，統屬於慕主教權轄之下，至此分爲二，遂另立一主教焉。

「一八九一年，美道會有宣教師八人，爲該會創辦人之第一團，聯袂來華；至一八九二年二月始入本省。該團領袖爲赫，當即創設宣教事業於成都，更推行於樂山一帶。在此期間內，美以美會之宣教事業，亦已發展於成都及巴縣隣近各地，並伸張其勢力於東至成都之大道左近各城中；而內地會之創設宣教事業於各地亦不下九處，且新增教堂甚多，又赫於樂山設有印字館一所。

「四、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又至一九〇〇年 一八九〇年揚子江流域內之排外風潮（帝國主義

污蔑中國人民反帝鬥爭之謠」，駁斥乎有延及西陲之勢……卒暴發而演成一八九五年之慘禍。即以成都一城而論，凡屬基督教與天主教之教堂房產等，皆爲劫掠搗毀一空，西人亦均避入官署，一月後，始脫險而至上海。一八九八年亂事又起，人民復欲搗毀教堂，驅逐西人。一八九九年爲拳匪（帝國主義污蔑義和團之語）亂事之前一年，排外風潮正盛時，有八十宣教師聚大會於巴縣，其會議通過事項中之可記載者有三項：即設華西教會月報與華西聖書公會，並組織華西差會顧問部等。一九〇〇年夏，本省差會雖未遭拳匪之餘禍，然已由領事迫使各宣教師出境，而逃至沿海各地也。

「五、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二一年此時期即各宣教事業之擴張時期也。又此時期中，有數處之宣教事業皆已積極進行，而各差會尤顯有聯合運動之趨勢。一九〇五年美道會印字館已遷於成都。一九一〇年華西協和大學校成立，且組成華西教育會。一九〇八年華西大會派定一教會聯合會之常年委員。中華基督教四川部顧問總會組成於一八九九年，各差會皆派有代表，每年開會集議一次，討論同工互助之方法，如該部力有未逮者，即有教會顧問部輔助進行；而教會顧問部，則爲西宣教師與華信徒組成於一九一三年間。以上三機關職員，每年同時集合於一地。」（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華歸主中文版）

各時期內建設之總堂表

（同上書）

教 派	總堂數 目	時 間	一八六〇年 以前	一八六一至 一八八〇	一八八一至 一九〇〇	一八九一至 一九一〇	一九一一年至 一九二〇
聖 宗	1						
英聖公會(十女部)	1						
	6						
	4						
	3						

(二) 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的罪行

帝國主義分子，披着宗教外衣，深入四川各地，進行間諜活動，侵犯我國主權，欺壓我國人民。在英法聯軍之役以後「各國教士，無論有無官爵，輒與各省大吏抗衡。地方大吏以和約內有『厚待保護』字樣，遂不與之較論尊卑。……道路側目，誹謗橫生，滋事之由，多係乎此。」（清史列傳：卷五十
二頁三十九）

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又「四處招延盜賊姦民，以與地方爲仇。……於是作奸犯科，一倚教堂爲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與人爲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縣、廳、鎮凡建有天主堂者，地方輒不能安其生，而教士之勢乃張，爲禍至於無窮，川黔兩省此害尤烈。」（清季外交史料：卷十
郭嵩焘：請嚴訂神甫資格）

惡教士欺壓人民的罪行，散見於各種記載，今略引幾則：

「天主教之傳入當同治末年（一八七四年）。傳教者多法人，於大北街建一堂，榜曰天主，主教稱司鐸。入教者非奸民即愚民，嘗鑽衙舞弊，干涉地方詞訟。光緒庚子辛丑間（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氣焰尤熾。知府夏成綬、知縣袁黼卿均因教案罷誤，人民愈切齒。」（清國新修南充縣志：卷十
一頁）

百零六）

「有法教士謀民宅種害事，自法人行教中國，凡與民涉訟，地方官吏輒猗達，鴻鵠畏首尾，傍皇

失措，稱善治者歟。」（民國溫江縣志：卷七頁十四曾傳琴堂嘉宴記）

「教徒武斷鄉曲，官吏偏袒，往往激成教案，禍中國家，吾縣亦屢見之。」（民二十一年灌縣志：卷二十六頁七）

長壽「天主教教民共二千四百八十四戶，男女約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一人（該縣人口約三十三萬餘），福音教民共九百一十二人。當光緒二十餘年間，教民稱盛，地方官憚其勢，動輒迎合其意，屈抑平民，憤怒所集，釀成教案，往往有搗毀教堂之事。」（民國續修長壽縣志：卷三頁四十六至七。）

陳秉和奏：「洋人愛某處房宅，其人不賣，則尋一無業奸民，先指爲已有物賣於洋人，並串通書吏竊印文約，洋人即據爲已有驅逐業主。地方不敢科以盜買盜賣。」（沈嗣生：光緒政要：二十二年總理衙門議教士不遵約章請飭申明條約事。）

教堂即是大地主，由下面的統計可見一斑。

地 區	時 間	教 徒	教 產
川西平原〔一〕		四千八百餘人	十五萬畝
重 慶〔二〕			房地產四百五十餘處
彭 縣〔三〕			白鹿場天主堂有土地一萬畝以上
彭 都〔四〕	光緒十五年	二千五六百人	教堂四，田產千餘畝，載糧二十兩餘，房屋七十所。
新 都〔五〕	光緒七年	六百餘人	街房一院，舖面十八間，水田三百餘畝。

〔一〕川西平原 土改時資料，天主堂是成都平原第一名天地主

〔二〕重慶 巴縣鄉土志：卷上頁二十四

〔三〕彭縣 四川農村經濟：頁九〇

〔四〕彭山 重修彭山志：卷二頁十四

〔五〕新都 民國新都縣志：卷三頁二十六

(三) 帝國主義侵略四川的罪行

中英烟台條約規定英人取得由四川入西藏到印度探路權以後，帝國主義在四川大肆間諜活動，所謂「來川游歷者日見其多」。「英人萬德福等行經巴塘赴藏……改由滇省而去。……本年（一八七八年）二月初間，英人貝德祿（英國駐重慶第一任領事）由重慶起程前赴嘉定、銅河、義邊、越羈、打箭爐（今康定）各處，自赴老林打獵。……而該英員改道中途，多不由大路行走，每於人跡罕到及曾經封禁之路，銳意前進，護送之人勸之不可，而沿途行踪詭秘，所到之處，詳繪輿圖，並與法國教士往來甚密。」（丁寶楨：丁文誠公奏稿：卷十四派員出洋遊歷片）

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三年）英帝分子立德，造成了適應川江水淺流急的輪船，強入川江。四川人民拒絕英輸入川。清朝政府以英使催得很急等語電川督劉秉璋，要劉從速解決。最後劉秉璋以十三萬兩購買了立德這支船及碼頭設備，超過立德的造價四倍。英帝允於十年內不派輪船駛入川江。以後，中

英烟台條約英帝取得川江航行獨佔權。（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十八至八十二）

「同治中，海禁開，洋貨充物，紗、布、糖、油入中國，沿江上溯，土物不能抵制，利溢於外。

惟罌粟用抵印度土，歲入數百萬，競趨之，而兩湖、江西、廣東商匯銀至川東收買，以涪爲聚處，川、黔土多在涪成莊。大吏移土厘局於涪，以道員督理稅收，每年數十萬兩。」（涪陵縣重修涪州志：卷十八頁二）

清政府於夔府（今奉節縣）設卡征收厘金，帝國主義者包攬走私。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四川總督吳棠報總署，查出美國公泰行走私船隻。而美帝公使艾忭敏竟向總署稱美國公泰行二十一支船被夔關扣留要求賠償。自同治十三年至光緒元年「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五年」間，英商怡和洋行被扣三十三支，泰昌行被扣十五支。法帝的范若瑟主教每年一次由上海領單一紙運送教堂中應用物品。英美公使要求清政府賠償損失，更要求「坐扣洋稅」；還蠻橫地說，再不然便「只得令本國水師提督辦理」，以武裝保護走私相威脅。結果清政府賠錢賠償損失，放行船支了事。（據光緒朝中法外交史料：卷一總署奏夔關扣留貨物及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十八總署致川督電等材料。）

（四）買辦階級的產生

擁有資本的人家，向兩個方向發展。一種是屯積販運糧食：如涪陵縣的「富人歲收穀市斗至三千石者計資不過十萬，乾嘉以前無聞焉。道咸以來，南坪陳氏、北坪何氏、蘭市孟氏、李渡徐氏、清溪冉氏、深溪余氏可指數也。米、豆載運至宜沙，名六陳行，聞徐氏致富以此，余氏亦用此成業。何、

余模臣與四川農民反帝運動